



上海大学社会学文库

主编 / 张文宏

在理性与幻想之间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的制度和话语考察

马丹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社会学文库

主编 / 张文宏

在理性与幻想之间

——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的制度和话语考察

马丹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理性与幻想之间：中国中产阶级兴起的制度和话语考察 / 马丹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161-7392-3

I. ①在… II. ①马… III. ①中等资产阶级—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4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王安忆：《隐居的时代》

目 录

引 言	(1)
一 中国中产阶级的英语学术史简介	(8)
二 中产阶级的历史进程	(16)
三 章节安排	(18)
第一章 中产阶级问题背景	(25)
1.1 个体主义的反思	(25)
1.2 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何以重要——社会学“共时”批判 ..	(28)
1.3 问题的提出	(30)
第二章 中产阶级合法性的论证	(35)
2.1 “去政治化”的中产阶级	(36)
2.2 “稳定器”理论辨析——中国中产阶级研究述评	(41)
2.3 中产阶级的解释逻辑与叙事困境——以部分学者的 代表性研究为例	(67)
讨论 自在抑或自为	(87)
第三章 流亡者的“想象共同体”——改革开放三十年流亡 电影的中产阶级意识	(89)
3.1 转身	(90)
3.2 想象的共同体	(92)
3.3 出走	(104)
3.4 夜奔	(107)
结语	(112)
第四章 中产阶级产生、萎缩和恢复的政治语境	(115)
4.1 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	(116)

4.2	毛泽东论中间阶级	(119)
4.3	“又红又专”的邓小平时代	(127)
	余论	(138)
第五章	中产阶级社区的涌现——从住房改革的角度梳理	(140)
5.1	现实问题的存在	(140)
5.2	住房改革的文献综述	(141)
	讨论 住房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162)
第六章	都市景观的再造——郊区社会变迁的集体记忆与经验 ..	(166)
6.1	新城美化运动	(168)
6.2	职工电影院的怀旧	(169)
6.3	郊区的边缘化	(172)
6.4	静寂的工厂	(176)
	讨论 工业景观的衰退，社会空间的再造	(182)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历史蜕变	
	——“去政治化”的先声	(185)
7.1	知青大潮研究综述	(187)
7.2	初级市场：饥饿与匮乏的满足	(194)
7.3	笨拙的“自由主义”	(199)
结语	(212)
	一 中产阶级的历史隐喻	(213)
	二 未完成的个人主义	(218)
参考文献	(224)
后 记	(241)

引言

从事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有一段时间，但是对中产阶级真正产生兴趣，是从近期对 S 大学的大学生访谈开始的。访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学生的社会关系很丰富，他们通过有限的社会阅历对中产阶级的思考，很有意思。这些思考既有对成功的渴望，也有阶级意识的流露，同时，还有对社会不平等心理的调剂作用。部分访谈者不认为中国有中产阶级，不过，对于自己的未来（新的有产者的未来），却很有信心。一位访谈者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是成为雄厚财富的资产者。一位访谈者表示想移民东南亚，过上富有的生活。这一矛盾在诸多访谈中都有体现。将中产阶级作为公共议题在大学校园进行小规模尝试，给了我一点自信。表述当中的道德体验和理性，以及未来的指向，相互交织，形成了现实的自然化。越是对未来憧憬，观念越是显得真实。这和学者们对于中产阶级“稳定器”的功能论述是相通的。只不过后者所传达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不再虚幻，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且叙述的价值在个体处于未然而应然的时候，思想反而有鲜活的力量。

2013 年春，位于静安寺的上海展览馆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房展会。我和好友在房展会浏览了一圈，带回来一厚叠房地产广告。挑选出一部分广告，呈现给访谈人，请他们各自谈一谈看到这些广告后的反应。

有意思的是，两位访谈人创造了一个选择题的情境：“户口和 200 万（用来买房子）之间，你选择哪一个？”我能感觉出来，没有父母对首付的支援，个体主义的奋斗信条成为别无选择的贫寒子弟的行为信条，而关系网的沟通、社会地位的强调，成为家境优越的子弟在闲谈中流露的身份意识。更为诧异的是，谈到对于蚁族的看法，H 会用新阶级的概念来解释蚁族的不联合、不团结的“一盘散沙”状况。但是他所定义的新阶级——蚁族，基于社团联系的合作（创业），将知识的生产转化为生产力，和贝尔所

说的知识阶级、古尔德纳所说的新阶级，依然有质的不同。他期待的是家族和知识精英的联合，以家族为单位，实现社会的整合。H告诉我，他小学时候，有一次在学校监考（一份不错的兼职），刚巧他的妈妈来学校找他，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装作不认识他的妈妈。当我用张鹏（Zhang Li）举的事例“住在老婆的房子里，男人直不起腰板”与他交流时，他回应道：“有什么不可以。”男人的面子让位于终极目标，换言之，“弯下腰”是暂时的。道德和个体利益的获取与维护，是并行不悖的。Z已经安排好了他的企业家成长道路。毕业后，他准备创办一家私营建筑公司，承包项目，在利润和金融投资的结合策略中，实现个人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他曾经在学校有不俗的编织袋生意业绩，也投资期货，刚刚小赚了一笔。和“90后”大学生的初步交往、个体交谈，我感觉到，专业理性（主修不一定是自己的选择，通过辅修其他专业，进入自己想从事的行业）、经济理性以及感情理性等等汇集起来的个体理性，异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因为是70年代生人，我还做不到把个体与道德分离起来，但是在实践范畴，“90后”的年轻人，已经将不同领域的游戏规则分得异常清晰了。所谓道德范畴的冲突，在理性面前，显得“婆婆妈妈”，让人不安。贝尔说：“这将是一场灾难。”贝尔考虑的是个体私利如何与公共福利平衡，远离了福柯对伦理的关怀。当个体的语言建立了合法性时，例如，个人空间、私人财产、知识产权，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与自我的反思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不复和谐却在建立一种新的整体关系，即个体主义的信念与行动相统一的整体关系。

房展会还不可能把房子像白菜一样出售，奢侈品却可以像白菜一样抢购。运用价格双轨制，通过免税店、直销店这样的组织形式，通过境外旅游的方式，把商品成批量地带回来。首尔专设了为中国人购物的免税店，成批成批的中国游客被旅行社拉到这些大型免税店，进行疯狂的购物（购物条件之一是出示护照）。^①当我也卷入抢购韩国化妆品的人潮时，自

^① 在我看来，韩国为中国人专设的免税店，既符合亚洲人的消费习惯、语言环境，又和国际接轨，比美国的outlet（品牌直销地）还要便捷、实惠。有人说，韩国正在替代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韩剧在大陆的热播，“韩流”正在加入中国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想象和向往行列，当然，韩国对于中国的地位更像是加拿大对于美国的位置，国际性视野感觉并不强烈。尽管如此，很多人通过韩剧来了解韩国社会或韩国文化。国内涌现了诸如“韩国城”消费场所。

己也纳闷：物质的消费为何如此狂热？欲望为何如此强大？当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当中指出技术和知识占据的核心地位时，我怀疑他低估了消费前卫与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群体的相互支持关系，后者正在形成新自由主义支持的巨大市场。

在从事中产阶级研究的四年多的时光，房地产市场正在扩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私有产权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当中。这四年多的时光，对我而言，仿佛一夜之间，私有产权的观念降临到个体层面，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苦恼和家庭矛盾。这四年多的时光，每一次返乡，在我熟悉的 A 城，清晰地看到了符号的替换：房地产的圈地运动吞噬了破产的工厂。2011 年伊始，因为地方融资的失败，大量房地产工程不得不遭遇停顿。这些盘踞在街区的被围墙围起来的长满荒草的土地，就像是垃圾场，张着大口，空洞地望着天空。正是这悄无声息的变化，引发了我内心的恐慌。尽管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主张重工业、军工业向民生经济转型，但是这突如其来的市场化的转型摆在眼前，还是感到惊愕。这四年多的时光，对于写作而言，逼迫着自己从书斋里解脱出来，观察这场蜕变。写作发生了奇妙的“延迟”效果，当我在上海 S 大学访谈部分大学生有关中产阶级的看法、态度以及自我与中产阶级的关联时，A 城陷入了非法融资断裂、房地产泡沫、无数“中产”之家破产之后的经济萧条状况，迟迟无法走出。廉价市场形成一个空间内部的多个集散地，吸纳了“贫穷”的大众、分化的生活方式，散发着语言的活泼的能指活力。^①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中国中产阶级涌向首尔、拉斯维加斯等“购物天堂”，向“现代性的他者”（Mordern Other）输出强大的消费欲望并形成

① 廉价市场和中产阶级的消费运动一同增长。廉价市场满足了贫民阶层对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小商小贩叫卖的语言丰富多彩，令人忍俊不禁。卖挂钩的广告词把买实惠、结实的挂钩和赌博、吸毒、卖淫以及结婚、择偶联系起来，意思是说与其赌博、吸毒，不如买个挂钩，选老公要选疼人的，找老婆要找白头偕老的，买挂钩也要买我这样的。我惊异于它强大的转喻能力。实际上，挂钩销售和其他社会词汇毫无关系，但是商家竭力想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当中来发现商品的价值和意义。商业宣传的启发是：恰恰是意识形态的疏离，使得市场不得不把意识形态和草根、大众联系起来。不过，市场天然地排斥意识形态的灌输功能，它仅仅巧妙发挥了转喻功能。从中，我也观察到草根的生活方式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可谓是天壤之别。不得不承认，平民的生活消费，占据了更为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一“下流”走向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保罗·福塞尔的说法就是“贫民化的趋势”。

不可小觑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消费仍旧是塑造中国中产阶级在国内、国际的身份和地位的实现途径之一。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中产阶级，“素质”正在普通人（normal people）的生活语言当中运用。^① 一个新兴阶层，正在以世俗化的面貌，野心勃勃地向一个方向靠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阶级认同。这一方向别无选择地抓住消费建构的身份和地位区别，私有产权建构的私人领域的空间，以及文化资本建构的阶层内在的同质性，来不及像保罗·福塞尔那样对中产阶级格调的嘲讽，顾不上像米尔斯那样对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的冷漠和空虚——巨大的精神危机敏锐的揭露。剔除了马克思对于中间阶级“一身毛病”批评与期待兼有的厌恶论调，代之

① 有意味的是，看到一些不文明现象，例如晨练的人利用树木“打秋千”，乱采花，参加合唱团的老年人纪律涣散、一盘散沙，我的婶婶使用了“素质”这个词来批评这些“不良”行为：没有素质。在早市，她从未说过“素质”，但是在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她第一次使用了“素质”这个概念。这至少传达了一个差异的讯息：文明和素质是和公共领域的传播相关的（个体有自律的义务，属于社会性强制的道德范畴），市场是个体性逐利或互惠行为（隐含了个体不需要为公共环境的卫生与公众健康负责）。婶婶在公共领域自动开启“素质”的语言模式，将周围的人看作他者。虽然素质有自我修养与礼貌、礼仪、穿着打扮相互映衬的综合特征（文化素质仅仅是素质的一个层面），素质可否理解为“自我管理”（self-governance）的含义？言下，只有人人讲素质，才会有社会的提高。我以为，素质是针对个体的文明教化。它是和现代化并行的自我管理的模式。这个道理和个体的经济理性等于个体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素质在毛泽东时代极少作为整体宣传，毛泽东个人似乎偏爱身体素质，以体育为手段强身健体。相较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通过公共领域的社会治理来培养个体的公共性，个体的自治是基于个体自由的友爱、信任与慷慨给予的社会精神。现代国家起到了物质、空间或象征的支持作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所嵌入的制度框架，会作出时代性的感召与回应。阎云翔讨论到个体主义需要弄清楚“私”与“公”之间的关系。同时，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权力实践”，实际上是微观社会的权力实践。阎云翔的结论是个体的崛起和个体化社会的崛起。刘新倾向于使用自恋与反人本主义、物质性、客观性等词汇来描述当下社会的人物自传。个体是统计学意义的个体，彼此毫无关联，冷漠、“同一张面孔”而又以自我私利为中心。所谓中产阶级刚好是搭乘同一辆车的异质性很强的“乌合之众”（这一概念排斥了阶层认同、身份认同的讨论）。他多次引用瑞瑟曼（Riesman）对美国国民性的比喻——孤独的群体（the lonely crowd），来折射当下的中国。我以为，无论是素质话语（接近全民教育），还是个体主义，反映了分析单位的变化。前者关注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想要成为文明代理人衍生的语言、教育和市民身份的优越性，后者关注算计、理性和私有产权意识在个体层面的启蒙与觉醒。张鹏强调中产阶级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背负了沉重的传统负担而不得不付出的个人代价。话语和实践整合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正在崛起的社会图景正在形成。社会越分化，中产阶级的生活愿景越来越有感召力。这是生活的悖论。我在第二章“中产阶级合法性的论证”当中进行了“稳定器”理论辨析，以及第五章“中产阶级社区的涌现”描述了中产阶级社区的符号意义。

以改良性质的“中间阶级扩大化”社会理论与事实。中产阶级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形成，当意识到市场转型不能解决一切，从文化身份再到教养、伦理和自我修养等知识的内化上还准备不足。也就是说文化的传统还未给这个“全球化的中产阶级”的民族身份与地域传统赋予足够的权威和教育积累，因此，在文化的养成方面，还难以摆脱焦虑的心态。市场并未失灵，文化代理人、品牌代言人与开发商联盟，创造了满足文化需求的展览会。这些展览会不仅开发了风格的体验模式，而且创造了比中产阶级文化高级的文化等级。古董收藏和滑翔、游艇、“时装秀”杂糅一体。房地产开发商从房展会开始，精心策划会员制的私人会所、公共空间，围绕这一链条，文化的传统正在从模仿向创造转变。它表达了中产阶级对于文明的渴慕与向往。但是理想究竟是什么，也没有确定的定义。所谓文化传统的创造其实是理想的具体化。想象力变为了“能指的任意性”。^① 尽管中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是被拉动的，和现实的弱小相联系，消费欲望从反面透露出中产阶级在“长征路上”的野心。境外购物，对国际品牌的喜好和追求，这一物化的过程，在《格调》的开篇一针见血指出：对等级的渴求。^② 保罗·福塞尔描述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的通病在改革开放成长中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中产阶级（准确说拥有自驾车的中产阶级）均有体现：中产阶级的家居摆设惧怕意识形态，“是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摆设”。喜爱收藏。喜爱商品邮购，会仔细研究商品邮购的小册子。喜爱旅游，因为观光业能够从中“买到感觉”，体验一回上层文化的感觉。“度周末”兴起于1978年。喜爱读书，注重阅读品位，但是本能地抵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书籍。对意识形态的惧怕弥散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贫民窟不说“贫民窟”，而说“城市化未完成”。修辞也掩饰意识形态的倾向。语言“假斯文”，善用、常用委婉语。相信读者读到这里会露出会心的微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是惧怕意识形态的，同

① 最好的参考资料是开发商委托房展会的方案策划书或文案。组织房展会的商业机构对消费受众有精确的阶层分析，然后根据阶层分化，具体化为“看得见”的人群。这一策略被称为“生态龛”，锁定核心消费群，再来量身打造房展会的文化体验模式。首要的设计要素是文化需远离中产阶级可触的现实生活，唤起中产阶级的向往和期待，打造一个吸纳和融入的互动平台。

② 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样在本能地探索文化身份，既有语言的矫饰，又有商业的渗透（广告对上层贫民和中产阶级影响的方式不同）。2000年伊始从私家车的市场讯息辨认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还达不到像福塞尔那样积累了丰富的阶层知识，例如判断阶级属性的测验表、客厅评定表（1935年美国的社会阶层已经相对固定）以及生活方式指导（例如《权威预科生手册》）——仅仅以“新富阶层”含混地引入到全球化消费主义的视野。文化和阶层的关系只有结构化之后，“另类”才有可能从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创造性的、没有依附性的“无阶层”的阶层。

但是对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而言，无论是新阶级，还是另类，还是不依附于任何阶层的自由职业者，都不得和中产阶级缠绕起来，以至于中产阶级的合法性刚刚建立起来，又要进行剥离意识形态的工作。刘新干脆用“冷漠”来形容这些没有关联的统计学意义的个体，但是，问题是挣扎于中产阶级的“华丽的奢华与精打细算的审慎”之间的内心冲突、地位恐慌、谨小慎微，这曾经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内心写照。这个新人（new man），在现代性的竞争过程中，以个体化的方式达到物化的同一化，这一过程也是那么不易。不适应的个体不断地被淘汰，失败者总是哀叹为何没有实现人们眼中的成功？

一方面，当下的中产阶级的心态是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学术传递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并不吻合。当我拿这一概念与真实的群体“对号入座”，当遭遇更多的反诘和质疑时，我并不能从容应对。差异与延迟，构成了我的写作意识。我试图探讨：差异与延迟，既是中产阶级认同的障碍，又有可能突破、转变为统一的整体意识。我不再检测概念的本真性，试图创造情境，通过情境，来探索“毫不关联的个体涌入同一辆公共汽车”获得的情境实践。我借助对S大学的大学生调查问卷，运用归纳和统计，探索影响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的因素。^① 我

^① 调查问卷的题目是《S大学学生的消费购买与文化的调查》。该问卷调查是对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或购物实践的研究。在S大学对大学生随机发放问卷，有效问卷258份。问卷调查时间：2014年9月到2015年6月。该问卷调查是一项合作课题，问卷主要设计者是肯塔基大学地理系教授斯坦·布朗（Stan Brunn），我和丽萨（Lisa Hoffman）加入了各自感兴趣的问卷题目。我询问消费品牌、网络购物，霍夫曼关心大学生对慈善和志愿者的看法。感谢斯坦·布朗（Stan Brunn）对问卷的设计。

发现，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一员的群体，个体主义支持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① 消费惯习起到积极的作用。个体受到父母的个人价值观与消费观的双重影响较为显著。在理论与经验的研究过程，我很难将客观与主观截然分开。

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来看，中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一身毛病”，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仅消失了，而且拥有了另外一套修辞来补充。政治疏离用政治参与来弥补，个体冷漠用爱国主义来填补，边缘中产阶级在网络上容易宣泄的激进主义用中产阶级放宽政策来缓解。社会学家一边从市场转型的角度研究中产阶级客体，一边开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药方，市场和社会构成的两个语言系统反反复复在中产阶级的建构与批评当中回应、再现。对于中产阶级主体，超出消费、住房、收入等物质领域的精神、心理与认同等主观世界的认知，无形当中移交给文学。因此，对于写作而言，不自觉地在文献梳理和文化批评当中游走。在现实与表征之间，我尝试把文学表征与社会学叙事的类型连接起来，它们交替出现，反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构成了中产阶级文化的叙事逻辑与社会学的叙事类型、社会调查与访谈——这三者之间的“差异与延迟”效应，构成了我的研究对象。

在结论中，我发现，中产阶级既是幻想，又是事实（因为物质化的存在），又是理想，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真实。个体化，既是统计的技术运用，又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涌动的个体主义的思潮相互融合。个体主义思潮经历了两个阶段，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是晚期的状况，我探寻的是它的原始阶段。它蕴含了希望的种子，重申了个体主义的精英意识。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中间阶层的精英作用下，发挥社会一体化的功能，才能推动民主和自由。连接皇权与大众的士绅阶级一去不复返，认清事实，用行动解决中产阶级概念与事实的矛盾。文化表征应该使中产阶级对自身社会处境的辨认更清晰，而不是在制造“差异与延迟”的社会治理技术中相互瓦解、相互迷恋，例

^① 在调查问卷中，个体主义被分解为三个问题：1. 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会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他人。2. 我希望有更多的钱花在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上。3. 我对他人感兴趣，但是对自己更感兴趣。

如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对精英导向的个体主义的遮蔽，消费与市场的异形同构。澄清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蔓延，我在结论中对中产阶级的认同赋予了信心，对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行动方向也获得了认知。这信念来自笨拙的自由主义，由剩余物承载。我深信，惠特曼对大工业时代到来的讴歌与赞美，个体主义的讴歌与赞美，会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克服幻想、事实与理想矛盾产生的“差异与延迟”的障碍，形成实质的社会阶级力量，改变历史进程。

一 中国中产阶级的英语学术史简介

（一）英语文献概述

中国中产阶级进入英语学术世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通过东亚中产阶级的发现，随着改革开放新富阶层的出现和“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中国中产阶级才逐渐成为英语学术界的研究对象，进入中产阶级的议题。学者最初是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继承了东亚中产阶级的哪些共性，又有哪些特性。以大卫·顾德曼为代表，通过对山西私人企业家的研究，他将中国中产阶级定位为“新富阶层”，且与政党关系密切。美国布鲁斯学会的李成则将社会转型涌现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精英，按照职业标准：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定义为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新中产阶级”。戴维斯从消费的角度探讨中产阶级与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革命的关系，涉及住房改革、消费模式产生的社会分层，继续与过去的短缺经济发生对话关系。张鹏、汤芭（Luigi Tomba）等学者从住房改革入手，通过房地产市场培育的中产阶层，探讨国家住房政策在产生和扩大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产生的社会隔离与社会分层等复杂影响。张鹏运用“社会空间”的概念，对社会空间建构中产阶级的城市景观进行描述。侧重于国家对中产阶级的建构和中产阶级在社区的生活空间体现出来的实践和特性。丽莎·霍夫曼（Lisa Hoffman）同样从职业标准出发，关注从大学生群体进入人才市场，寻求专业与技术职业的结合，进入中产阶级队伍的过程。她把职业教育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提出“又红又专”的爱国主义表现。正是因为诸多学者开始把中国中产阶级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初步的研究领域，较之1990年代初由萧新

煌 (Hsin - Huang Michael Hsiao) 发起关注东亚中产阶级的学术会议和论文编辑, 并没有把中国中产阶级包括在内的情况, 进入 21 世纪, 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

近十年来, 不但出现了全球化理论视角的中产阶级比较研究, 而且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专著。这一时期中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有走向国际学术的特点, 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也有关系。也有部分学者寻求对这一社会转型的分析和解释, 提出“新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等说法, 这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对于西方学者, 他们更想了解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实。因此, 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俄国、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蔓延到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中国、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印度又放在了相似的学术平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在继续发生影响, 并且转换为新中产阶级的支持话语; 如“素质”这一话语, 与个体主义相互交织, 进一步凸显了社会空间的矛盾与冲突。

(二) 研究过程

中国中产阶级何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入英语学术世界? 我们这里进行简要的回顾。

首先从两本书开始说起。由萧新煌主编的《在东亚发现中产阶级》(1993) 和《比较视野中的东亚中产阶级》(1999)。从《在东亚发现中产阶级》的前言了解到, 编写这本书是由学术会议促成的。1990 年 6 月 14—16 日, “中产阶级和东亚发展”会议召开。1994 年底, “比较视野中的东亚中产阶级和国家发展”会议召开。支持这些会议以及资助的得益于一个台湾基金资助的课题, Multi - Year East Asian Middle Class 简称 EAMC, 即东亚中产阶级项目。在导言中, 编者这样说道, 东亚中产阶级的讨论和中产阶级在东亚的出现不无关系。台湾学术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中产阶级, 1989 年开始讨论中产阶级。香港大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阶层分化。同时 70 年代也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新加坡国家住房政策对产生和扩张“业主”中产阶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 这两本书可以说开创了东亚中产阶级研究的先例。在

目录中没有中国中产阶级的身影。道理似乎也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分享新经济主义的果实的过程中姗姗来迟。1992年，邓小平刚刚发表南方谈话，这要看先富阶层什么时候被“发现”。

1996年，古德曼（David Goodman）和罗宾逊（Richard Robison）主编的《亚洲新富阶层：移动电话，麦当劳和中产阶级革命》出版。这是同一个出版社推出的“新富阶层在亚洲”的系列出版计划，另外三本书在以后陆续出版，继续探讨亚洲的新富阶层和消费、生活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的亚洲的文化与特权》、《亚洲消费：生活方式与认同》。学术组织者来自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罗宾逊是负责人之一。在《亚洲新富阶层》导言“新富阶层在亚洲：经济发展、社会地位和政治意识”当中，编者这样写道：“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非常重要，控制、统治和能力超越了劳动的范畴，资产阶级并不必然与自由民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导言写得晦涩难懂，但还是能看出编者尝试把握亚洲新富阶层的特点，所以，在中产阶级的概念加上了一个新富阶层的亚洲对等物。在这本书中，包括对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泰国以及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探讨。在《资本主义的亚洲的文化与特权》（1999）当中，其中有一篇文章针对中国的改革与社会变迁，题目是“革命是怎样成了请客吃饭的：城市中国的分层、流动与新富阶层”，作者是布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

2008年，古德曼主编的《中国的新富阶层：未来雏形，当下生活》出版，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式作为主角，登上了世界中产阶级行列的舞台。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是来自亚洲或中国研究的美国或澳洲学者以及香港学者，它是主编动员和组织他的学术圈资源合作完成的产物。当然，以古德曼的导言为连接线索。古德曼以研究山西企业家作为研究中产阶级的切入路径，新富阶层，沿袭了罗宾逊（Robison）的说法。他认为“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私人企业家与政党的关系亲密，等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深入人心，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不少争论，既然有争论效应，就有引用效应，因此颇为经典。看来中国的新富阶层被“西方”发现了。

与这本集子相似，2010年，美国布鲁斯学会的李成编辑出版了《中国正在涌现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转型》。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干脆直接提出中产阶级的用法，而不再用新富阶层含糊代替，指出中国中产

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将注意力较多放在了职业标准上，如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正在形成中产阶级的的主力，因此，如何保护、照顾、倾听这一阶层的诉求、利益和福利，就成为决策层不能忽视的因素。该集子吸纳了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收录了李春玲和周晓虹的文章。这二位是中产阶级学术共同体研究的代表人物，前者强调高等教育与中产阶级的关系，后者强调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促成的中产阶级的产业结构力量。这些特点，较之古德曼的传统说法，为该书增添了进步的色彩。

与这些由论文组成的专题探讨不同，张鹞的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民族志专著令人瞩目。继《中国的陌生人》、《私有化中国》之后，2008年，她的大作《寻找天堂：生活在中国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出版。2012年由荷曼（Rachel Heiman）主编的《全球化的中产阶级：通过民族志实现理论化》收入了张鹞的论文，以此填补中国中产阶级的位置，可见作者的分量。在《寻找天堂》中，张鹞提出“阶级空间化”的概念，通过对昆明某高档住宅小区（也就是她自己住的）的研究，她指出，中产阶级是社会空间的产物，于此造成的住宅隔离和孤独的漂移，也就成为大都市一道景观。这一研究方法一反过去的方法，从住宅私有化切入，探讨“创造中产阶级”、“表演中产阶级”的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力量交织。这一叙事手法在萧新煌主编的东亚中产阶级专题，例如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已经有所展现，强调国家在塑造中产阶级的角色和作用。张鹞的作品可以说用民族志的经验使这项抽象研究“在地化”或具体化。显然，一个作品、理念或研究并非一蹴而就，这中间经过了学术会议、学术团队和学术交流的曲折过程。张鹞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任教于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系。2004—2006年，参加了在上海、威斯康星、纽约等地召开的中国研究的学术会议。例如2004年6月28—29日，亚洲研究协会在上海召开关于“私有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应用”的年会。这些来自美国东亚研究学术团体的会议、学术交流，使得跨越双重身份、接受人类学系统训练以及英语表述的中国经验论著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好评。

相较于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几部其他较新的编集，也力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探讨中产阶级的基于国别和地方而展现出来的特殊性。这些编著，如荷曼主编的《全球化的中产阶级：通过民族志实现理论化》